

# Column

■东鳞西爪

## 中式英语·英式汉语·港式表达



◎周 到  
西南证券研发中心副总经理

允许内地个人直接投资香港证券市场后,为吸引更多的内地居民更快地投资香港上市证券,香港证券监管部门、香港交易所、香港上市公司是否也要更多地考虑内地居民的语言表达乃至其他方面的习惯呢?

赵启正那篇《京剧不是“北京歌剧”》(载《在同一世界——面对外国人的101个话题》)很有意思。文章说,京剧英译为Peking Opera(北京歌剧),使外国人误认为是北京风格的《茶花女》、《卡门》。这一中国艺术形式因此失去原有的风韵。作者因而按梅葆玖等的建议,希望把京剧音译为Jingju。京剧也称京戏。笔者认为,如果开始外国人觉得费解,可以解释为local drama of Beijing(北京的地方戏)或traditional opera of China(中国传统戏)。使用的次数多了,外国人也接受Jingju一词了。

无独有偶,随着奥运会的临近,中国菜名的英译也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据说,四喜丸子、驴打滚、麻婆豆腐的英文分别是Four Glad Meatballs(四只高兴的肉圆)、Rolling Donkey(翻滚的毛驴)、Bean Curd Made by a Pockmarked Woman(麻子脸妇女制作的豆腐)。老外如果认真一些,要求见见麻子脸女厨师,饭店怎么办?笔者猜想,佛跳墙等中国菜名的英译可能也会使中国人忍俊不禁,外国人不知所云。这样的翻译,实在吃力不讨好。因此,有人建议中国菜名可以音译,下面用英文注明该菜肴的原料和烹饪方法。其理由是,标准的法国大餐菜谱在法文菜名下,用法文注明该菜肴的原料和烹饪方法。老外如果对音译中国菜名有兴趣,中方可以作进一步

的解释。这样,中国菜名的原意就不会受到损害。

一般情况下,汉语要比英文简洁。“妻子爱丈夫”,虽然只有三个词,但主语、谓语、宾语都有,是一句地道的中文。在此,人们既不会猜测妻子有几位,也不会因为未列出所有格而怀疑她红杏出墙。而英文的表述则是“A wife loves her husband”,比汉语多出两个“零部件”。但按我们的习惯,如果把它再译回“一位妻子爱她的丈夫”,大家反而容易联想:要是这男人先后有两位或两位以上的妻子呢?度宗赵祺“既立,耽于酒色。故事,媵妾进御,晨诣阁门谢恩,主者书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谢恩者三十余人”(《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根据宫中旧例,媵妾侍寝次日早晨要到阁门谢恩,主管太监据此记录受幸日期。因而,度宗赵祺至少同时有三十多位妻子。像这种情况,上述意思的英文表述只能变成“The wives love their husband”(这些妻子们爱她们的一位丈夫),一下子换去四个“零部件”。宋大明八年(464年),前废帝刘子业即位。“山阴公主,帝姊也,适驸马都尉何戡。……公主尤淫恣,尝谓帝曰:‘妾与陛下,男女异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驸马一人,事大不均。’帝乃为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山阴公主刘楚玉在婚姻制度上追求男女平等,别出心裁。其结果是,她同时拥有何戡和另外三十位帅哥猛男丈夫。针对这种情况,上述意思的英文表述恐怕应该是“The wife loves her husbands”(这位妻子爱她的丈夫们)。上述变化反映出中文和英文表述习惯的截然不同。

中式英文固然搞笑,但英式汉语同样使内地居民别扭。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中文有自身的特点。以上市公司定义为例。《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称:“本法所称上市公司,是指其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而《公司条例》第2条第(1)项称:“‘上市公司’(listed company)指一间公司而其任何股份是在认可证券市场上市的”。两者意思相同。但一些内地居民可能会觉得前者表达顺畅,后者佶屈聱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述?我们一看后者的英文本就明白:“‘listed company’(上市公司) means a company which has any of its shares listed on a recognized stock market”。老外对中式英文有时不容易理解,那么,内地居民对英式汉语是否也不太习惯呢?



香港的书面语言有时还带有文言文痕迹。新华文轩(0811.HK)是最近招股的内地上市公司。其《新上市股份配发结果》按香港习惯,一口气地照本宣科:“以下为使白色申请表提出申请而获全部或部分接纳的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号码(‘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如有提供)及彼等获有条件配发的公开发售股份数目。”而洛阳铝业(3993.HK)《招股章程》中也按香港习惯,依样画葫芦:“我们于中国注册成立,……准投资者亦应注意中国的监管构架与香港

不同”。内地居民会在“香港”前面冠以“中国”。但在规范的现代汉语中,如果不是掉文,他们不会使用“彼等”、“亦”之类的词或字。而这样的表述,在香港官方文件和证券市场中普遍存在。

允许内地个人直接投资香港证券市场后,笔者希望香港证券监管部门尊重内地投资者的语言习惯。更值得注意的是,内地的股票投资者,毕竟是少数。若是将来潜移默化,连利索的规范汉语都不会说了,怎么与土生土长的老婆孩子、亲戚朋友顺畅地交流呢?文化融合是双向的。中国内地上市公司在境外上市时,很尊重当地的语言习惯。新华文轩、洛阳铝业等即如此。因此,为吸引更多的内地居民更快地投资香港上市证券,香港证券监管部门、香港交易所、香港上市公司是否也要更多地考虑内地居民的语言表达乃至其他方面的习惯呢?

总之,就人才选拔制度而言,很多人觉得今不如昔。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古代的教育资源看似向每个好学者开放,并且,只要考中,人人都有机会出人头地。用学术的语言说,就是过去的科举为社会提供了很高的社会向上的流动性,而今天的教育制度不能。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有趣疑问,自上世纪中期开始,这一问题就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持久兴趣和激烈争鸣,至今方兴未艾。那么,科举真的是底层读书人的阶梯吗?不妨看看在科举制度完备的明代,情形到底怎样。明朝建立之初,由于官员选拔途径的多样,科举作用相对较弱,同时,明太祖朱元璋对科举的成效和进士的行政能力也颇存疑虑。在科举初行不久的洪武六年,就因先前所任用的进士、举人不能称职,而下令停开,直到洪武十七年方恢复。恢复后的首科虽然录取了472名进士,其中竟有150余人因受赃不职而在洪武十九年遭到处罚。可见,作为一种选官制度,科举也不见比科举等制度优越,这一点至少已为朱元璋所确认,但他为什么在诏停科举达十一年后又下令复开呢?王朝统治秩序底定的明代中期何以要撇开科举和学校,而独尊科举呢?归根到底还在于,相较于历史上的察举、九品中正和同时代的荐举、学校等选官制度,科举是最便于操作的成熟制度,在维护等级社会结构上,它有其它制度无可比拟的操作性优势。

科举制度下,要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必须首先具备符合制度要求的知识,并通过规定的考试,科举因而成为社会成员中知识阶层(士阶层)的专利。而在教育资源有限的中国明代,士资格的具备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制于其对教育资源的占有量。优势阶层凭借国家所赋予的特权及其固有的雄厚经济基础充分占有教育资源;普通民户即便可以穷一寒,一族之力供养个别子弟读书应试,但微小的录取率还要求他们有足够的经济能力重复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或会试。可见,科举竞争是对教育资源的竞争开始的。教育资源的竞争不过是社会分层的折射。你是什么阶层,就决定了你有无受教机会和受教于什么样的教育机构。这样,科举在帮助享有“教育专利”的

■彼岸

## 经济自由:印度“第二次独立机会”



◎袁晓明  
管理咨询顾问,专栏作者,现居美国达拉斯市

今年是印度独立60周年,《福布斯》杂志亚洲的高级编辑罗宾·梅瑞迪斯撰写了一篇专栏“第二次独立的机会”。在专栏中,梅瑞迪斯认为印度当年从英国赢得了政治上的自由,今天的印度人面临另一个历史性的独立机会,但本次的独立不再是政治上的,而是在经济上获得独立,也就是印度人的经济自由。

在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欧美等西方国家在民主制度下并同时执行市场经济制度,不同程度地在经济上有了极大发展,其国民财富有相当的增加,国家整体也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在亚洲,日本、南韩等国也相继实现了经济起飞,在经济实力上与欧美国家有了平起平坐的地位。但遗憾的是,作为人口最多的、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国家,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印度经济却一直发展缓慢,至今,虽然在软件以及服务外包上有了极大的发展,整体经济也在不断增速,但印度的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每天只有大约2美元的生活费用。

按梅瑞迪斯的看法,那数以亿计的印度穷人虽然不再受英国人的统治,并有了政治上的许多权利和自由,但一天只有两美元却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自由。很明显,梅瑞迪斯的这个判断受了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对自由定义的影响。罗斯福曾经提出,如果人没有经济上的自由,也就是说,人如果连温饱都不能有的话,人有了自由也不是一个自由的人。罗斯福这样的思想产生于美国的大萧条时期,当时美国人也有比较充分的政治和人权上的自由,但罗斯福相信,那些没有工作的美国人,因为他们没有钱去养活自己和家人,他们就没有经济自由,因此,他们不是充分享有自由的人。

虽然梅瑞迪斯充分自由的概念是从罗斯福那里来的,但梅瑞迪斯并非接受并赞同罗斯福更多以政府手段帮助穷人的观点。梅瑞迪斯直言,印度面临的挑战是政府不能解决的,反

而由于政府的过多干预,在一定程度上还加剧了印度的贫穷,更不能帮助解决贫穷问题。梅瑞迪斯建议的方案是,新德里应该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应该把重点放在建设基础设施上,以更好的投资环境去吸引外资,并鼓励更多的印度人进行私人投资,从而帮助印度穷人获得就业的机会,为脱贫致富创造条件。

可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印度民主的政治制度让选民更相信那些要以政府行为解决贫穷的左派政客。过去几年,印度左派政客在政府中的势力不断壮大,正是那些左派政客以保护穷人的名义阻挡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致使印度经济不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去满足更多人的巨大就业需求。在另一方面,印度过去的殖民历史在文化上让印度人对外来企业有一种阻碍。当然,无可否认的是,过去的这些年,许多西方软件公司在印度建立了分支机构,但那只是给了少数印度知识人才致富的机会,而绝大多数印度穷人仍然没有能提高收入的工作机会。事实上,印度更需要的是自由经济体制下的大量投资建厂,以充分利用充沛的劳动力资源,但那些不相信自由经济的左派政客却更加看重政府行为。而最大的麻烦是,许多印度穷人并不清楚左派政客不能从根本和长远上帮助他们。过去几十年来,印度政坛基本上被左派政客统领,他们提倡的经济政策给印度经济带来了更多的危害,阻碍了印度人的脱贫。

因此,民主政治是更加代表民意的政体,但仅仅有民主的政治并非能给公民带来经济上的自由,公民需要利用民主的政体选出能够执行自由经济体制的政治家,从短期和表面上看,也许自由经济体制并非对穷人很快带来直接的利益,但从根本上、长远上自由经济体制能够帮助穷人脱贫致富,因为自由经济体制才能给人带来经济自由,这就是当今民主政体下印度人所面临的机会和挑战,也就是梅瑞迪斯所说的“第二次独立的机会”。

■古往今来

## 科举时代的人才流动



◎宗 韵  
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 古籍研究所讲师

常常听见身边的朋友开玩笑说,要是在古代,本科生至少也相当于举人老爷啊,要是博士呢?嘿嘿,当然更不得了啦,四品大员总是有的吧?考试科目就更不用说了。古人只考“语文”,现在的中学生呢?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还要懂洋文。再者,过去的“教材”常年不变,就那么几本书,完全可以自学,并且可以考到头发白,总有中举的时候吧?而一旦考取,可谓鸡犬升天了。

科举指挥棒下的读书人本身就是不断被儒家意识形态同化的过程,对制度的维护和对秩序的遵守自然内在于其中。

科举的覆盖面则代表了等级思想为人所接受的范围。明代除每科取中的200多名进士和1000多名举人之外,全国有不下50万的应考生员,甚至背后的数百万书生都是明代科举直接笼罩的对象。并且,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家族是政治与社会的基本单元,明代许多景况不好的家族集中全族力量或许只能应付个别族人科考所需的费用,即使景况稍好的普通家族最多也只能承担两三个读书应举者,其他成员则负责经营生计以供养这些肩负家族梦想的举人。这就要求全社会服膺于科举制及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和政治传统。

公平、公正和客观是科举制度着力塑造的形象特征,表征着科举竞争是没有身份,没有职业区别的学识竞争。首先,明代基本取消了对应试者原始身份与职业的限制,把选拔范围扩大到真正的平民。其次,以程文优劣为录取标准,八股文这种文体在体式、结构和字数上的明确规定就是使评卷规范化和客观化,控制评卷过程中误差出现的必然结果,评判具有很客观性。鲁迅先生说:“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

最后,“胡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好学者则庶民之子为公卿,不好学者则公卿之子为庶民”,“由来白屋出民间,眼底穷通未可凭”等等这些流传于民间的箴言,表明科举的开放性、公平性已深入人心。科举虽然促成了特定成员社会地位的变化,但却不会破坏既有的分层结构;相反,由于它为人仕之门向平民子弟敞开,不仅给下层人们以希望与信念,也激发了上层人群为垄断优势而进行知识竞争的意识。所有这些都增强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弹性与活力,维护了既有秩序。

少数人垄断上层社会地位的同时,就不断地将社会中已有的阶级结构复制出来。

为消弭社会下层的均平意识,并给现有的等级秩序套上合法、神圣的外衣,封建时代中后期的统治者们越来越依赖儒家思想,强调每个社会成员出身和身份的“贵贱有等,长幼有序”,遂将阐发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列为科举考试的全部内容,明代科举因而成为传播儒学的最有力途径。科举指挥棒下的读书人本身就是不断被儒家意识形态同化的过程,对制度的维护和对秩序的遵守自然内在于其中。

科举的覆盖面则代表了等级思想为人所接受的范围。明代除每科取中的200多名进士和1000多名举人之外,全国有不下50万的应考生员,甚至背后的数百万书生都是明代科举直接笼罩的对象。并且,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家族是政治与社会的基本单元,明代许多景况不好的家族集中全族力量或许只能应付个别族人科考所需的费用,即使景况稍好的普通家族最多也只能承担两三个读书应举者,其他成员则负责经营生计以供养这些肩负家族梦想的举人。这就要求全社会服膺于科举制及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和政治传统。

公平、公正和客观是科举制度着力塑造的形象特征,表征着科举竞争是没有身份,没有职业区别的学识竞争。首先,明代基本取消了对应试者原始身份与职业的限制,把选拔范围扩大到真正的平民。其次,以程文优劣为录取标准,八股文这种文体在体式、结构和字数上的明确规定就是使评卷规范化和客观化,控制评卷过程中误差出现的必然结果,评判具有很客观性。鲁迅先生说:“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

最后,“胡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好学者则庶民之子为公卿,不好学者则公卿之子为庶民”,“由来白屋出民间,眼底穷通未可凭”等等这些流传于民间的箴言,表明科举的开放性、公平性已深入人心。科举虽然促成了特定成员社会地位的变化,但却不会破坏既有的分层结构;相反,由于它为人仕之门向平民子弟敞开,不仅给下层人们以希望与信念,也激发了上层人群为垄断优势而进行知识竞争的意识。所有这些都增强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弹性与活力,维护了既有秩序。

■边上人语

## 见了真龙,怎么反倒装起了叶公

——“小产权房”面对的奇怪逻辑



◎胡飞雪  
职业投资人 自由撰稿人 现居河南平顶山市

位于北京六环和京沈高速公路出口附近的太玉园,是首都最大一处“小产权”楼盘,离最近的城铁车站不过一公里。新浪网站曾这样描绘这个楼盘:“将成为北京东部地区规模庞大、集别墅、公寓、住宅、步行商业中心、星级酒店为一体的欧式建筑群。到时候,将与世纪城、方庄、望京等大型综合居住区并驾齐驱。总开发面积是2000亩地。”楼盘介绍写明是“小产权”,价格很有吸引力:“2700元/平方米起价,均价3000元/平方米,最高3300元/平方米。”封面印有“镇人民政府监制”的“房屋买卖合同”标明的购房者权利也很诱人,合同第十条的明白:“乙方购房后对房屋享有永久所有权”。销售人员的解释是,这是农民的宅基地和农民房,没有“70年批租”的期限,所以“小产权房”的产权并不小。这“小产权房”的价格和价值使得潜在购房者即城市中低收入者受益,当地农民也相当满意。当地的老村改造过程中,农民的住宅“正房一前一后,偏房二前一后,村里赠送10平米,超出面积按价格600元/平米计算”。依这一新旧房兑换率,原住村民已全部搬进新房,组成现在的张湾村一区。

如今北京城五环以内已见不到均价低于每平方米万元的大产权房楼盘,对比之下,小产权房每平方米3000上下,比变了样,走了形的经济适用房更经济,当然更受购房者欢迎。据销售人员讲,下乡买小产权房的消费者大体是这么三类人:退休老人、年轻的上班族、投资户。

应该承认,“小产权房”的应运而生、横空出世,创造了一个多赢局面:农民,土地增值,也改善了居住条件,分享了农地增值的好处;购房者,主要是城市中的中低收入者,圆了住房梦。一种事物,往往可以有多赢局面呢?这就不能不提这个多赢局面吧?这就不能不提这个多赢局面的最关键的一个赢家,即开发商,他们深谙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规律。

相比之下,那些反对“小产权房”者,对市场经济核心规律怕是双锤擂鼓——不通。虽然他们常把

有关“市场经济”的口号挂在嘴上。建设部高官就曾高调告诫“小产权房”的购买者,“小产权房得不到法律保护”,北京市国土局也有“查明违规停建停售”的禁令。还有动粗动真格的,济南连续拆除“野楼盘”,采用爆破手段,电钮一按,六层建筑轰然倒地。为什么某些公仆不顾小产权房买卖各方的利益,意愿,非要除掉小产权房而后快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小产权房”不是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就是她们已所不齿,偏要硬施于人,要大伙都去高价购房。

任志强先生大概是最懂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少数人之一,他在“当住房保障遭遇制度困境”一文中说,廉租房的建设资金并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出在很多城市的廉租房补贴被挪用,钱没有花在该花的地方。非市场化住房大多为国家机关享用,我们称为特价房,特价房是指享受经济房待遇而不公开销售的部分住房,特价房中有一部分可能被用于贪污腐败,另部分则用于机关单位福利分房,它的数量远远超过了